



邓小平理论发展史

高屹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发展史

总主编：胡锦涛

第十一卷
1992—1997

邓小平理论发展史

高 岜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理论发展史 / 高屹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218-04559-6

I . 邓... II . 高... III . 邓小平理论 - 理论研究
IV . A849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5
插 页	1
字 数	420 千字
印 数	6 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559-6/A·22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前　　言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和实践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2003年2月20日)

李君如

明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新的实践为基础，深化对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我们都知道，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总是在再实践中获得再认识。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揭示的认识规律。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这一科学理论在再实践中，也会获得新认识。这种新认识，有的是邓小平同志没有讲过的，有的是邓小平同志虽然讲过，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现在学习和运用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十四大和十五大

所作出的科学概括。从十四大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从十五大至今也已有五年多时间，而这十年、五年多时间里，新的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认识开展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里，我想对邓小平理论创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以及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邓小平理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有没有历史必然性？

我们以往的研究，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由来已久，但是作为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现在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会成为这一历史转折和理论创立的标志。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决定的。自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客观的历史和经济政治特点决定了，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历史进入了当代史，决定了中国进入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众所周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在一个时期里，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为自己的工作方针，主观与客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以 1976 年的“四五”运动这样外部对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意味着党不面对客观的矛盾现实就会发生政治危机。粉碎“四人帮”，符合党心民心，其意义就在于它是客观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表现。但是，由于“两个凡是”观点的出现并在党内被作为一种方针确立起来，应该深入解决的矛盾不仅没有能够给予重视和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反而更加

突出起来。于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这次出面冲破主观束缚，以顺应客观社会矛盾要求的主体，已经不是“四五”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群众，而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套用一句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形势”成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的。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顺应社会矛盾发展的历史要求产生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第二，当代中国客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哪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等。其中，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要回答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我们以往的研究强调，邓小平同志注意到并且提出了第一个理论问题，而第二个理论问题是在十五大才写进党的文件并给予研究的。确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期间，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问题时已经开始提出了，以后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多地强调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多年来忽略了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还提出要回答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同志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而在这同时，即在这之前的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要求党的十二大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

才叫善于领导？”由于他具体地讲是要十二大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一问题看作是一个带有全局指导意义的根本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包括在编写《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时也没有引用这一论述，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认识到这两个根本问题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矛盾提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肯定这两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都是邓小平同志注意到并提出的。

第三，邓小平同志是怎样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的？

首先，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独立的问题。因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不仅包括党的建设问题，而且包括党如何执政即如何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执政党的问题。因此，他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获得的正确认识，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执政党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坚强核心。

其次，邓小平同志认为，搞清楚和回答好这两个根本问题在党的事业和理论中各有各的地位和承担的使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事业和理论的主题；而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探索党怎样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怎样执政，则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这两点可以说是在以往研究中已经认识到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下面这一点。

再次，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

前，重点回答和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问题。准确地说，他是通过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以，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强调，对于我们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同志在政治交代中，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到“两个取信于民”，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请大家注意这里用的是“聚精会神”这四个字！这意味着他从新的情况出发，把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作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一方面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决不能动摇，另一方面提出“将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第四，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什么关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两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的统一中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科学理论；同时，他又把进一步解决好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留给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就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注和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探索执政党建设，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讲”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这两个问题是中央最为关注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以“三个代表”来要求自己，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在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都是为了搞清楚和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在这三个基本方面，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地指明中国发展的根本走向的同时，为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按照邓小平的政治交待和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通过研究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样的根本要求，解决执政党的性质、纲领、基础和执政方式、执政能力等问题，来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坚持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过程中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因此，在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努力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党的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目 录

第一编 邓小平理论的萌芽	1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2
第二章 党的八大及其前后的理论探索.....	8
第三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思考和 艰难探索	18
第二编 邓小平理论的酝酿	33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思和 1975 年 “全面整顿”的背景和过程.....	34
第二章 实现安定团结	47
第三章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52
第四章 党的整顿是核心	59
第三编 邓小平理论的前奏	65
第一章 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66
第二章 北方谈话	74
第四编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85
第一章 历史的伟大转折	87

第二章	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107
第三章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133
第四章	全面拨乱反正，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150
第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
第五编 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17
第一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18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231
第三章	改革开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49
第四章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	271
第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理论的形成	288
第六章	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04
第七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	323
第八章	外交战略理论的形成	341
第九章	“一国两制”理论的形成	360
第十章	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77
第十一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形成	396
第六编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体系化		407
第一章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408

第二章	稳定压倒一切.....	416
第三章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 珍重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423
第四章	主持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	434
第五章	南方谈话.....	448
第六章	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	480
第七编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确立		509
第一章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510
第二章	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520
第三章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 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551
第四章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620
后 记		643

第一编

邓小平理论的萌芽

任何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明确指出：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我们研究邓小平理论，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从它的最初的历史萌芽入手，探讨其以胚芽形式包含着的对象，即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的重要范畴，即概念、原理体系的落脚点，也就是贯穿于整个体系的主线。

“邓小平理论反映的是中国和世界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的历史，是对中国和国际社会这一段历史的科学判断和把握。”^① 从理论的自觉和它对党的指导作用来讲，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应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成为党

^① 冷溶：《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考察，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则必须回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孜孜探索之中，特别是从党的八大，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时起。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在时代进步潮流中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论证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己任。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里最普通、最常见的商品交换关系入手，揭示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普遍规律，从而为全世界无产者争取解放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在20世纪初期，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提出了无产阶级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并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俄国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社会制度的形式第一次转化为现实。在20世纪初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依据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旧中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人民面前，即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历史规律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就作出过一些预测。在《哥达纲领批判》等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打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使之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自由；在此基础上，贯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不断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预测，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较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发生这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且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事实中揭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但是他们却向来反对缺乏实践依据地制定条条框框束缚未来社会主义者的手脚。1881年，当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后行动纲领问题时，马克思曾明确回答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

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① 1889年，当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康·施米特给恩格斯写信，提出自己要解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问题时，恩格斯作出了同样的回答：“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来！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他们的视线开始投向东方社会，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思想：以资本主义和现代无产阶级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先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首先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尚未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首先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经过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步实践，列宁看到了俄国的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差异，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在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4页。